

论余姚虞氏家学的特质及其形成原因

辜筠芳

(宁波教育学院 教育行政学院, 浙江 宁波 315010)

摘要: 分析了虞氏家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认为: 虞氏家学具有“重视儒学研究, 兼涉史学等领域; 家教严格, 树立忠义门风; 不尚武”等特质。其形成原因为: 严格把持门风, 世代崇文,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关键词: 余姚; 虞氏; 家学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627 (2012) 02-0028-04

魏晋南北朝时期, 今宁波境内已经置有句章^①、鄞、鄮^②、余姚和宁海(时属临海郡)5县, 不过, 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却大大异于中原地区, 依然保持越地独特的风土习俗, 人们信鬼神; 尚祭祀; 不崇“礼”制; 等等。

但从西汉末年始, 因躲避频繁战乱而大批南迁的农民、手工业者、士族等纷纷落户今绍兴、宁波等越地, 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 以及儒学思想。历经漫长的磨合和发展, 这次人口迁移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宁波等越地的文化教育发展, 也推动越地文化从富有民族特色的地域文化向中原文化的转变。

在这一过程中, 经余姚虞氏家学所创新的儒学文化, 以及家学所培养的人才, 对宁波地区儒学、史学、文学、书法等学术思想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本文拟以余姚虞氏家学背景, 分析家学的特质及其形成原因, 并追踪这一历史阶段儒学是如何植入宁波的内因外缘。

一、家学兴盛的历史背景分析

家学是以家庭或家族为主体而展开教育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它的兴盛与士族势力在政局动荡的特殊时期中的崛起有关。

东汉末年, 社会动荡剧烈, 一些世家大族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乘乱建立自己的私家武装, 这不仅有利于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也有利于保护地方上的安宁, 进而取得地方上的政治、经济特权, 对国家统治产生一定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 王朝更迭现象颇为频繁, 但在政治斗争中占

据优势地位的士族集团可以保持不变。萧子显在《南齐书·王俭传》中就讲过这样一个事实: “晋氏登庸, 与之从事, 名虽魏臣, 实为晋有, 故主位虽改, 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 习为旧准, 羽仪所隆, 人怀羡慕, 君臣之节, 徒致虚名。贵仕素资, 皆由门庆, 平流进取, 坐致公卿, 则知殉国之感无因, 保家之念宜切, 市朝亟革, 宠贵方来, 陵阙虽殊, 顾眄如一。”^{[1]23} 可见, 士族势力的影响之大。

这一社会现实也导致人们观念的变化, 即殉国之感无因, 保家之念宜切。如果丧失家族门第, 则家族的一切利益全部丧失。因此, 为了树立和维系家族门风, 扩大社会影响, 这些世家大族非常重视对家族后代的培养, 逐渐形成了“家学”以及“学在家族”的局面。所谓“五朝名家, 靡不有家教, 所以立身处事, 有以渐异”、“巨宗重臣, 咸有训诫”^{[2]178} 说的便是这种已经士族化的家学。当时, 山阴的谢氏、王氏等士族家学颇出佳绩, 山水诗人谢灵运、书法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 都是家学教育的极好典范。就宁波而言, 时属会稽郡的余姚虞氏家族便是规模最大、政治地位最高、社会影响最广的士族代表。另一方面, 由于官学在当时的动荡年代已经衰废, 家学的兴起在客观上撑起了这一时代的文化传承重担。我国近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就曾指出: “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 博士传授风气止息后, 学术中心移于家族, 而家族复限于地域, 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者不可分离。”^{[3]17}

收稿日期: 2011-06-10

作者简介: 辜筠芳(1968-), 女, 浙江宁波人, 博士/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E-mail: guyunfang2006@gmail.com

二、余姚虞氏家学兴盛的表现

从较为可靠的文献记载看,虞氏有迹可循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中叶。时值大批中原民众迁居于南方,更因官方推行儒家教化,宁波等越地百姓纷纷趋经业儒。虞光正是在此种社会环境下“少治孟氏《易》”,并因此官至零陵太守^{[4]57}。这进一步激发了族人演习儒家经典以从中开辟仕进前途的热情。据虞翻自述,其祖四世传孟氏《易》:“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澹述其业,至臣祖父夙为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夙,最有旧书,世传其业,至臣五世。”^{[4]57}

此外,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政府分置会稽、吴两郡,同时,会稽郡政治中心向浙东移动,这给了会稽郡的世家大族更多的举官机会,在客观上对于虞氏家族社会政治地位的抬升也起到一定的作用。至东汉末年,虞氏在会稽郡已成长为当地的著姓望族,其学术远播至中原。

三国时期,在吴郡、会稽郡士族支持下建立的孙吴政权,对两郡士族和世家大族都特别重视,虞氏家族的众多子弟纷纷登上孙吴政坛,官至高位。其中,虞翻的表现最为出色,他不仅在经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他所开创的“蹇谔匪躬”的行事风格深刻地影响了后嗣,进而发展为虞氏的家族性格。

在孙吴亡国之后,虞氏家族的发展在西晋政权中因受到中原人士排挤而处于低潮。直至西晋后期,虞潭凭借军功引领虞氏家族再度在政治上崛起,同时,虞喜、虞预则“以儒学立名”。^{[5]168}此后,历经东晋、宋、齐、梁、陈,虞氏家族的政治地位、经济基础和学术文化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完成其士族化进程。

在隋唐时期,虞氏家学发展至顶峰,先后涌现了虞绰、虞世基、虞世南等杰出人物。其中,初唐时期的经史学家虞世南是一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学者,其研究领域涉及书法、文学、史学、天文学等方面,且均有重要成就,他编纂的《北堂书钞》、撰写的《帝王略论》,都是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其中的《帝王略论》是较早从政治家视角评论历代帝王才智贤愚、为政得失的历史评论专著。根据正史和地方史等史籍的统计,这一时期虞氏家族有确切史料记载的人物有20余

人,著作有63种2000多卷,另有《集》著8部75卷。^{[6]50}纵观其家学,真可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三、余姚虞氏家学的特质及其原因分析

(一) 虞氏家学的特质

1. 最重儒学研究,兼涉史学等领域

(1) 以治孟氏《易》为家学传统。自虞光始,虞氏家族世传孟氏《易》,传至虞翻,其《易》学研究成果颇丰,撰有《周易注》《周易集林律历》等书,名满全国,影响深远。至此,虞氏作为儒学世家的地位得以最终确立。据《宁波通史》研究,虞翻所治易学是以家传的孟京筮占派象数易学为其渊源,继承东汉荀爽的经学派象数易学,并加以创造性发展而成。通俗地说,虞翻的研究旨在尝试性地说明为什么我们会在《周易》这一原始文本中发现六十四卦如此的排列顺序,虞翻力图以某些规则说明卦的排列乃是一种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演绎系统。^{[7]64}虞翻对《周易》所作的先行的逻辑探索为后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铺平了道路,后世的张慧言(1761-1802)在其《周易虞氏易》中将虞翻的逻辑原则加以极大地改进与系统化;焦循则在虞翻的基础上完成了后人在易学上难以超越的三部著作:《易通释》《易章句》《易图略》。这种研究成果使得晦涩的《周易》几乎成为可理解的儒学学派之哲学文献。由此可见,虞翻作为原创性的思想家对儒学的影响。

(2) 兼涉史学等领域。虞氏家学除了治孟氏《易》作为传统以延续族脉之外,还兼涉其他学术领域。首先,虞翻除了研究《易》学外,另有《老子》《论语》《国语》《史记》等训注,这使他成为东吴的史注权威。此后,虞氏家族好经学、史学之辈甚多。东晋时期,虞喜成为当时的经学专家,撰写《毛诗略》《孝经注》《志林新书》等经学著作,传于后世。其弟虞预修有《晋书》《会稽典录》等史书,前者为纪传体史书,记述西晋、东晋初的历史,因其由当代人所修,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后者则是一部早期浙江地方人物志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南朝时期,虞氏在经学上成就较大的有虞愿、虞僧诞,前者著有《五经论文》(10卷),后者精于《左氏春秋》,可谓“时人莫及”。而史学上的成就主

要表现为对方志和谱牒的研究上,当时,有虞荔所著的《鼎录》和虞愿所著的《会稽记》,前者为笔记类史书,记载秦汉以来帝王士大夫铸鼎的名称、尺寸、铭文、书法等信息,从中反映出时值的政治、风俗、礼制、书法等面貌,不失为我国鼎文化研究的专著,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后者为地志类著作,记载了会稽地区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甚有价值。

此外,虞氏家学还涉及天文学、文学、书法,以及饮食、娱乐等方面。如虞翻之子虞耸著有《穹天论》,概说天体结构,开虞氏天文学研究之先河;虞翻之孙虞潭著有《投壶经》《投壶变》《大小博法》各一卷,这对我们了解魏晋时期的社会闲暇生活有相当的价值。南朝时期的虞综著有《食珍录》,书中记载了很多烹饪方法,名噪一时;虞炎、虞羲、虞通之当以文学成就著世;而虞龢则代表了虞氏家学的书法成就。

2. 家教严格,树立忠义门风

门风是家族的核心价值观。它看起来是个无形的东西,但却是延续门第的文化内核。虞氏家学深谙此理,为此,家教甚严。自虞翻“蹇谔匪躬”的行事风格得到孙权认可,并惠及族人之后,“忠义”便成为家族门风,涌现很多“忠义”志士。虞翻之子虞忠在天纪四年(280年)二月兵败西陵之时,与镇南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据等人一道以身殉国。^{[5]42}南朝以来的虞氏族人虞玩之“竭诚事君”而“未尝厌屈于勋权,畏溺于狐鼠”。^{[8]18}虞综则面对西昌侯谋篡皇位之举由“称疾不陪位”乃至“乞解所职”。^{[1]37}虞愿亦多次直谏而得帝王宗室的器重。

为了保持忠义家风,虞氏家学十分重视子孙的门风教育。《晋书·烈女传》记载有这样的故事:

虞潭母孙氏,……性聪敏,识鉴过人。

潭始自幼童,便训以忠义,故得声望允洽,为朝廷所称。永嘉末,潭为南康太守,值杜弢构逆,率众讨之。孙氏以必死之义,俱倾其资产以馈战士,潭遂可捷。及苏峻作乱,潭时守吴兴,又假节征峻。孙氏戒之曰:“吾闻忠臣出孝子之门,汝当舍生取义,勿以吾老为累也。”仍尽发其家僮,令随潭助战,贸其所服环佩以为军资。于时会稽内史王舒

遣子允为督护,孙氏又谓潭曰:“王府君遣儿征,汝何为独不?”潭即以子楚为督护,与允合势。其忧国之诚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绶。潭立养堂于家,王导以下皆就拜谒。^{[5]96}

由此足见虞氏家教之严格,门风之严谨。正是家教的严格,才导致门风的维系,并使家道得以常兴不衰,绵延六朝,直至唐朝。

3. 不尚武

虞氏家学的另一特色便是其尚武精神的缺失。虞氏家族自东汉中叶以来,以文起家,却也未曾摒弃尚武精神,尤其是西晋后期的虞潭凭借军功再度崛起政坛,为虞氏族走向朝堂奠定了基础,并于东晋早期实现家族的士族化。虽然,乱世从武给家族带来了荣誉,但虞氏家族并不尚武,至东晋末年,家族的尚武精神已经失落。

这导致虞氏族无从利用乱世,以建立军功的方式,拓展其政治发展空间。不过,这倒更衬托其世代从文的家学特色。

(二) 虞氏家学兴盛的原因分析

从宏观上讲,虞氏家学的兴盛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因为在政局动荡的年代里,家族的振兴才是最有意义的,也是个人保存自身的一个重要条件。

从微观上讲,虞氏家学的兴盛与其自身“士族化”的进程是分不开的。“所谓‘士族化’便是一般原有的强宗大族使子弟读书,因而转变为‘士族’,这从两汉公私学校之发达的情形以及当时邹鲁所流行的‘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的谚语,可以推想而知。”^{[9]222}虞氏家学就是信奉这样的理念而励精图治,不断总结办学经验,在历史的风雨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家风。其“办学经验”从以下三方面得到体现:

1. 严格把持门风

如果说时局的动乱无法把握的话,那么家族的门风则相对容易实行。这在虞氏以忠义为门风的家教中可见一斑。对门风的严格把持不仅反映了家族立身处世的准则,而且折射出家族面对乱世所表现出的独立性,因为没有这种独立性,家族可能就会面临丧失门第之危险。

2. 世代崇文,稳固其学术地位

自东汉以来,在“劝以官禄”的文教政策指

引下，治经成为入仕的捷径之一。虞光便由经学入仕，激发族人累世治经修史。家族的累世经学自然带来了累世公卿的结果，治经便成为巩固门第之宝。因此，如何使《易》学发扬光大，便成为虞氏家学的重要任务。也正因如此，家族十分重视对其子弟的经学教育。

3.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士族垄断政治的黑暗，使门第始终处于分化之中，加之政局的动荡，士族高门急剧跌落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南朝以来虞氏家族的政治影响、社会地位远不如三国、东晋时期。因此，家族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能在社会中站住脚，保存实力，就必须去奋斗，这必然督促后辈重视操守，学会各种本领。士学家学由此兴盛起来。家学使得家族的生存、利益得到保护和发展。

四、结语

总之，余姚虞氏着力维持的家学从主观上讲，是其家族兴旺发达的推动力；但从客观上看，虞氏家学在乱世中传承并发展了儒学文化，并进一步改变了宁波文化教育的面貌，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具体表现：第一，辉煌的家学成就推动着宁波地方文化从远离皇城的边缘化意识走向与中原文化相融合的文化追求；第二，通过家学导致家族兴盛的现状激励着地区民众重视对子弟的教育，尤其是学习儒学知识的热情，这从隋唐及至后来民间重学风气可见一斑。如唐慈溪上林湖颖川府君且谗“家传儒雅，艺术精通，里闻

风犹若群之从凤也”。^③朱梁贞明间（915-920年），罗甫自桐庐黎家避乱至慈溪孝顺里罗江，“教以礼敬，讲学务农，蔚成善俗”。^[10]第三，儒学思想意识的植入，进一步改变了宁波地区民众淡薄的礼教观念，并导致其文化性格的转变。

注释：

- ① 据考证，句章古城原在今城山渡一带。东晋隆安四年（至公元400年），孙恩义军攻破句章城，城池毁坏严重，无以修复，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宋武帝乃迁句章县治于今鄞县鄞江桥。
- ② 鄞县包括今宁波市江东区及东乡一带，县治在鄞山。
- ③ （唐）咸通七年（866）颖川府君且谗墓志录文，见章均立《越窑瓷墓志》，浙东文化2000年第1期。

参考文献

- [1] 萧子显. 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2.
- [2] 王伊同. 五朝门第[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
- [3] 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4] 陈寿. 三国志·虞翻传（卷57）[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5]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6] 张彬. 浙江教育史[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
- [7] 方东美. 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M]. 匡钊，译. 郑州：中国古籍出版社，2009.
- [8] 严可均. 全齐文·上表告退（卷18）[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9]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10] 慈溪县志·流寓传（卷40）[M]. 《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

On the Traits and Causes for the Yu's Family Studies in YUYAO

GU Yun-f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NingBo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ingbo 315010,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tries to survey the traits and causes for the Yu's family studies by analyzing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It demonstrates the traits of Confucianism and historiography in the family studies, and the properties of strict family education, loyalty, justice and avoidance of force, mainly arising from the family's worship of strict tutorial and traditional advocacy Confucianism as well as its vigilant awareness in peace times.

Key words: family studies; traits; causes

(责任编辑 夏登武)